

專訪徐鑄成嫡孫徐時霖：潘漢年李濟深支持到香港辦報

香港《文匯報》荷李活道涅槃重生

香港《文匯報》喜迎創刊75周年。作為一份歷史悠久的報紙，香港《文匯報》從1948年創刊之日起便植入愛國愛港的基因，始終與祖國同行，為港澳同胞傳遞及時、有深度的新聞信息，記錄祖國偉大成就的每個重要歷史瞬間。值此75華誕之際，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北京專訪了香港《文匯報》主要創辦人、著名報人徐鑄成的嫡孫徐時霖，重溫文匯昔日「涅槃重生，香港創刊」的歲月和「大咖」薈萃、文章報國的經歷。

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、凱雷 北京報道



◆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徐鑄成。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



◆位於中環荷李活道30號的香港《文匯報》舊址(1948-1955)。建築物上有慶祝國慶燈飾。資料圖片



◆1981年徐鑄成在香港。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

「祖父於1948年3月在上海開始籌辦香港《文匯報》，隨後兩次往返上海香港之間，廣泛商議並落實具體事項。9月香港《文匯報》創刊後，他擔任總主筆，全面負責言論工作。當時總經理沒有到任，他也兼管經理部工作。」徐時霖介紹。彼時，上海《文匯報》剛被國民政府關停，潘漢年和李濟深都支持徐鑄成到香港創辦報紙，徐鑄成回覆稱：「我要去辦，就辦《文匯報》，別的我不考慮。」在香港各界愛國人士的大力支持下，1948年9月9日，香港《文匯報》正式創刊。

晚年常夢到斗室中寫社論

徐時霖長期致力於整理研究祖父徐鑄成保留下來的日記和著作。他指出，徐鑄成參加《文匯報》的經歷主要有五個時間段，其中1948年9月到1949年2月創辦香港《文匯報》，是「最緊張、最有挑戰性」的一段經歷。當時，祖父雖然已經有了二十多年辦報經歷，主持過上海《文匯報》和《大公報》分館，但這次是社長、總編輯、總主筆一肩挑，除了把握輿論外，還要處理許多以前自己只看到過沒有實際操作過的紙張、印刷、發行等業務。

「祖父晚年常常在夢中夢到伏案荷李活道的斗室中發稿子、寫社論」。徐時霖介紹，籌備之初，香港《文匯報》位於荷李活道，房子極為狹小，在寸土寸金的香港顯得相當侷促，如在「螺螄殼裏做道場」。兩張桌子、幾把條椅、尤為老式的印報機器，是僅有的設備。編輯、記者也不過二十餘人，都集體租住在雲咸街的两間宿舍裏。

徐鑄成在回憶錄中也記載，當時白天要為經理部操勞，晚上寫作及審稿至晨曦初上，每天平均只能睡四五個小時。在座位背後是報館的保險櫃，每至精神不濟兩眼昏昏時，就靠保險櫃的柄打一兩個盹，是為「充電」，然後又精神振作繼續執筆。

籌劃經費得到解放區支持

因職工生活「開門七件事」必須維持，而機器「糧

食」白報紙及油墨等亦常捉襟見肘，徐鑄成稱自籌創之日起，便「天天如過大年三十夜」，極力張羅。

在香港《文匯報》初創經濟困難時期，李濟深和董必武都曾施以援手。其中，李濟深看到認股者遲遲不交款，便將其桂林的住宅出售，得港幣一萬元，率先交股。另外，有一批電纜預備在解放區出售，以所得利潤補貼香港《文匯報》，但是因價格原因未能成交。徐鑄成在回憶錄中記載，當時華北人民政府負責人董必武了解情況後，即囑姚依林辦理此事，並關照說：「這批電纜，由我們全部收購下來。不要講價還價，他們要多少，就給多少，他們是為維持香港《文匯報》而籌劃經費啊！」

郭沫若茅盾等參與編輯工作

香港《文匯報》創刊後，瞬即便受到知識界、工人、學生的熱烈歡迎。有一次，侯外廬的夫人告訴徐鑄成：「你們《文匯報》，幾乎常常引起我們家的矛盾。」徐鑄成愕然不解所以。侯外廬先生笑道：「她是給你開玩笑。我們一家人，清早起來，都搶着先看《文匯報》。她是誇獎你的《文匯報》辦得好。」

「創刊之初，香港人口約有80萬，加之澳門最多不足100萬，進步報紙無法銷售到當時還沒有解放的廣東華南地區，而香港已有10家以上的大報，要在這樣的環境下爭取到更多的讀者，非常不容易。」徐時霖說，香港《文匯報》創刊初期，「大咖」薈萃陣容一時兩無，堪稱中國新聞史上一大奇觀。

從具體的版面負責分工上，現在仍可以遙想初創時編輯團隊陣容的豪華：郭沫若與侯外廬主編哲學周刊、茅盾主編文學周刊、宋雲彬主編青年周刊、千家駒主編經濟周刊、翦伯贊主編歷史周刊、孫起孟主編教育周刊……社論撰寫人除徐鑄成外，千家駒、胡繩、金仲華等諸先生都鼎力支持。

徐時霖分析，香港《文匯報》能做到這一點，首先源於愛國精神的底色，國家處於危難，面臨命運抉擇，必然會有一批愛國志士站出來，香港《文匯報》正是在這樣的時候，高舉愛國旗幟，文章報國，報人報國，因此凝聚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人。同時，秉持文人辦報的公心，這與郭沫若、茅盾等進步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在精神上是相通的。

◆1988年徐鑄成為香港《文匯報》題詞。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



◆1954年9月，徐鑄成參加第一屆全國人大會議。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

特稿

「祖父說過，以一個文弱書生，立志要當好一個新聞記者，就是要以文章報國。」徐時霖說，徐鑄成格外推崇司馬遷著《史記》時以「不虛美，不隱惡」的態度書寫歷史的精神，由此在創辦香港《文匯報》時，即使面對各種誘惑和停刊風險，文匯同仁都能堅守自己的信念，發揚中國史家直書敢言的傳統，堅持正義的態度，富貴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以公平正義的精神報道新聞。

「不虛美 不隱惡」書寫歷史

1948年10月，香港《文匯報》創辦不久，國民黨當局發行的金圓券已出現下跌，徐鑄成認識到金圓券發行瀕臨失敗，外匯和相關物資的限購政策已經很難支撐下去，就寫了多篇社評，其中有《「只許成功」的金圓券》和《給金圓券算一筆賬》等，給金圓券「算命」，根據各種經濟情況和國民黨的收支現狀，斷言金圓券只有三個月的穩定。果然，當年11月初，物價管制和限購外幣政策放開，金圓券價值一落千丈。

徐時霖表示，在新聞媒體逐漸走向多樣化網絡化的時代，新聞理念的內容也在不斷擴大豐富。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的後代和新聞傳媒的讀者受眾，他覺得今天的傳媒界對香港《文匯報》創辦時的新聞理念仍可以有所借鑒。其中首要的就是，新聞工作者仍要堅守獨立立場，是非善惡不以人論，只以事實為依據報道新聞，不能因追逐個人利益做出損害新聞真實、客觀的行為。

「新聞工作者也要不畏艱險，深入新聞現場去獲取第一手資料。能吃苦耐勞，努力克服困難，突破阻礙，堅持探尋事實真相，將新聞事件完整客觀地呈現出來。」徐時霖說。

做讀者的「益者三友」

徐時霖在整理祖父遺作時發現，在包括創辦香港《文匯報》在內的諸多辦報經歷中，徐鑄成強調較多的新聞理念，就是報紙要做讀者的「友直，友諒，友多聞」的益友。

其中，「友直」指是非清楚、明確，對於社會上的不良現象敢於揭發，對錯誤的事情能直言；「友諒」指報紙能經常了解讀者的處境、苦悶、願望以及接受水平等，使讀者和報紙心連心，願意向報紙傾訴；「友多聞」指經常調查研究，了解本地、本省、全國和國際的形勢和情況，通過報紙向讀者無話不談，知無不言。通過踐行上述理念，香港《文匯報》成為讀者的「益者三友」。

徐時霖特別提到，在《文匯報》副刊欄目

「讀者的話」創立時，祖父寫了四句口號：「有話大家來說，有事大家商量，不論男女老少，人人可以投稿。」這在當時建立了與大眾溝通的渠道，拉近了報人與讀者的距離，切實反映廣大群眾的問題，得到了群眾的擁護。

「報紙要有品格，首先要敢於宣傳真理，同時深入地理解讀者的心理，比如他們有什麼甘苦之處，思想上有什麼疑難之處，有什麼具體痛苦、困難，報紙上要努力為他們反映，給他們解答。」徐時霖認為，徐鑄成在其新聞理論著作《新聞藝術》中提到的辦報理念，和上述要做讀者「友直，友諒，友多聞」的益友一樣，都是在強調報紙要努力服務大眾。

五湖四海用人唯賢 培養大批報界人才

曾擔任香港《文匯報》總編輯的聶緝弩先生晚年說，聚集各路人才之多、之全、之雜，當屬上世紀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香港《文匯報》。徐時霖觀察，香港《文匯報》注重培養人才，能夠五湖四海用人唯賢，方形成了一個整齊、有生命力、活躍的、志同道合的集體。

徐時霖指出，香港《文匯報》培養人才，其一是「不拘一格」，如名記者浦熙修，她與香港《文匯報》素無來往，特立獨行的風格也頗有爭議，南京《新民報》被停刊後，她仍堅持給上海報刊寫稿。香港《文匯報》創刊時，果斷聘請她為特約記者，寫出了許多重磅精彩的通訊。

其二是注重培養年輕編輯記者。徐鑄成說過：

「我的用人方針，抱用人唯賢的態度，頗能五湖四海。只要是愛國而有一定文化程度而又願意學習的，即使沒有一點新聞基礎也先吸引進來，教其邊做邊學。」創辦香港《文匯報》，他還說過，再困難也要培養人才，要走一步看三步，讓許多年輕的，愛國有正義感的，基本素質好但學歷不高、資歷不足的年輕人參與並逐漸委以重任。

其三是廣泛團結報館內外各路人才。不論社內社外，專職兼職，有一分力，發一分熱。香港《文匯報》創刊後不久全國解放，大量編輯記者回到內地參加工作。在人員流動非常大的情況下，香港《文匯報》仍能夠保持報紙質量不降低，風格不變化，正是這樣做的結果。